

「文學革命」的先驅及其批判者 ——論章太炎詩學的前後兩期

毛朝暉*

摘 要

章太炎是民國舊詩學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但他的詩學卻長期為其經史小學方面的巨大成就遮蔽而未獲重視，本文著重考察「文學革命」前後太炎詩學的轉變，說明太炎詩學前期作為「文學革命」先驅者而後期轉變為「文學革命」批判者的兩個面向，並針對這兩個矛盾面向的成因進行分析。本文指出早在「文學革命」之前，太炎已經提出革新詩歌的主張，包括詩尚意氣說和聲律調度、詩體等詩歌形式層面的革新，實為「文學革命」期間胡適、劉半農等人提出的語言、詩韻、體裁等形式層面詩學革命的先聲。隨著「文學革命」的開展，他卻轉變為一個「文學革命」的批判者。他認為詩歌形式層面的革新必須有一個底線，更重要的是，他尖銳地批評白話詩偏離了中國詩歌崇尚真性情的傳統。本文通過對太炎詩學亦新亦舊的矛盾性與複雜性的剖析，藉此為民國舊詩學與「文學革命」的關係提出新的反思。

關鍵詞：章太炎、詩學、文學革命、前後兩期

* 中山大學珠海校區哲學系副研究員。

Pioneer and Critic for “Literature Revolution”: The Earlier and Later Periods of Zhang Tai Yan’s Poetics

Mao Zhao-Hui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u Hai),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Zhang Tai Yan was a prominent representative of old poe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but unfortunately, his views on poetics have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Zhang Tai Yan’s poetics during “Literature Revolution”, unveils Zhang’s two facets as both pioneer and critic for this movement, and does an intellectual-historical study on how these two contradictory facets coexiste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Zhang had come out some revolutionary ideas such as promoting masculine poetry and reforming the form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These very new ideas made Zhang an actual pioneer of “Literature Revolution”. Nevertheless, Zhang transformed to be a critic as “Literature Revolution” lasted. He decisively defended that the reform of the form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should maintain a bottom line. More importantly, He criticized that the newly fashioned vernacular poem writing had deviated the lyr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poetic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Zhang Tai Yan, this paper also sheds a light on refle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poetics and “Literature Revolu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Keywords: Zhang Tai Yan, poetics, Literature Revolution, The Earlier and Later Periods

「文學革命」的先驅及其批判者 ——論章太炎詩學的前後兩期*

毛朝暉

一、引言

晚清民國之際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轉型時代，在社會、政治、文化等領域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革命」原是儒家政治哲學中的一個重要觀念，源出《易經·革卦》：「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¹舊有的「革命」觀念借助日文翻譯，並與西方近代基於民權觀念的 *revolution* 概念結合，反過來輸入中國²，在 20 世紀的最初十年醞釀出如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所說的「革命的迷思」（*mystique of revolution*）。³ 1903 年，鄒容、章太炎相繼發表《革命軍》、《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史學家一般以此作為中國現代革命意識趨向成熟的標誌。鄒、章等人的「革命」論述既包含傳統通過暴力除舊佈新的舊觀念也融入了追求世界性和現代性的新意義從而構成一種「現代中國革命話語」。⁴

* 在本文初稿的撰寫過程中，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林立副教授曾給予指導，並為我向《成大中文學報》撰寫初審報告。修訂時，兩位匿名評審提供了具有建設性的評審意見，亦令筆者受益匪淺。特此一並致謝！

¹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60。

² 富蘭克斯（Wolfgang Franks）即已指出這一點。見 Wolfgang Franks, *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1851-1949*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0). 此書未見，轉引自陳建華：〈現代中國革命話語之源〉，《二十一世紀》41（1997.6），頁 83-96。

³ Benjamin I. Schwar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3.

⁴ 陳建華：〈現代中國革命話語之源〉，頁 94。有關中國革命話語的研究近年成果頗多，可參看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李躍力：《革命與文學

文學領域也是如此。早在 19 世紀末，就出現了要求革新傳統詩歌觀念和形式的「詩界革命」，要求「改良群治」和「新民」的「小說界革命」，以及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藩籬的「文界革命」。文學領域的「革命」話語，經由晚清到民初二十餘年的蓄勢，終於爆發了 1917 年的「文學革命」。「文學革命」與新文化運動企求思想啟蒙的大方向步調一致，一方面大聲疾呼建立新文學，一方面則接連拋出《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等措辭愈益激烈的言論，要求對舊文學進行革命。⁵

在近代文學史的論述中，晚清的「詩界革命」和民國的「文學革命」大都被塑造為「革命者」的進步形象，近代文學史的書寫也較多地依賴「新文學」作家和批評家所建構的言論和文獻。反過來，被新文學理論家所標籤為「舊文學」的作家和批評家的作品及其言論則在文學史敘事中被邊緣化，成為被批判乃至失聲的一群。⁶

長期以來，舊詩學的言論與觀點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偏重傳統文學的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雖然提及章太炎的詩歌創作，卻沒有留意他的詩學主張。⁷在偏重新文學《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中，只列舉胡先驕一家舊詩學的言論；在祝寬的《五四新詩史》中，也只節錄章太炎、胡先驕、吳宓、李思純四家的觀點，作為「五四」時期舊詩學的代表。⁸祝寬將章太炎列為民國舊詩學言論的首位，這表

的深層互動：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革命話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David E. Apter &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Wendy Larson, *From Ah Q to Lei Feng: Freud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20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等等。

⁵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3-12。

⁶ 例如，郭延禮專章介紹了近代文學研究開創期（1919-1949）的九位重要學者，除了錢基博一人可以算是傳統文學的代表，在其餘八人中，胡適、鄭振鐸是早期主要的白話文學史家，魯迅、周作人兄弟是早期重要的白話文作家，陳子展（1898-1990）、吳文祺（1901-1991）、范煙橋（1894-1967）、楊世驥（生卒年不詳）大抵都是在「新文學運動」中成長起來的青年，他們不但在文學史的敘述中熱情擁護「新文學」的潮流，而且其中不少人同時還從事白話文學的創作，而對於所謂「舊文學」作家，他們大抵是忽略或批評的。見郭延禮：《20 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頁 21-77。

⁷ 錢基博將近代詩學分為魏晉詩、宋詩、中晚唐詩三派。其中，魏晉詩派以王闈運為宗，章太炎也是此派一位代表人物；宋詩派以陳三立、鄭孝胥為代表；中晚唐詩派則以樊增祥、易順鼎為代表。錢氏稱章太炎「詩不多作，每出一篇，韻古格高，欲軼湘綺。」評價可謂甚高。見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 179。

⁸ 祝寬：《五四新詩史》（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頁 71-80。

示章氏不但是晚清民國之際的國學大師，也是當時舊詩學的重要理論家，即便是主張新文學和新詩的人，也不能繞開章氏的言論而不予回應。可是，章太炎的詩學一直被他在經史小學上的成就所掩蓋，相關討論不多，與其文學史的地位遠不相稱。⁹雖然經由祝寬等人提出討論，由於對舊詩學心存成見，不免隨意取捨、語焉不詳。¹⁰

本文試圖指出，章太炎原是舊詩學的重鎮，也是現代「文學革命」理念的先驅，後來才被定調為近代文學史敘述中的「文學革命」的批判者。這前後兩種形象構成一對矛盾。本文著重關注太炎詩學與「文學革命」以及在此前後其詩學觀念的發展，嘗試從文學史的角度闡明「文學革命」對太炎詩學的影響，從而為上述兩種矛盾形象提出解釋。

二、「文學革命」之前的太炎詩學

為便利討論，先將章太炎的詩學言論進行編年，整理為目錄如「表 1」所示：

表 1 章太炎詩學著作編年目錄

篇名	出處	發表年份
〈辨詩〉	《國故論衡》	1910
〈六詩說〉	《檢論》	1914
〈與吳承仕書〉	《章炳麟論學集》	1918

⁹ 陳學然教授對截至 2013 年為止的章太炎研究文獻進行了全面統計，共計學術專著 73 種，學術期刊論文 1214 篇，著述或論文集單篇章節 114 篇。其中，與太炎詩學相關的單篇論著僅 3 篇：(1) 李笠：〈書章炳麟六詩說後〉，《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6：61（1928.12），頁 29。(2) 金東雷：〈章太炎先生詩辨論旨〉，《中央時事週報》4：22（1935.6），頁 66。(3) 劉奕：〈論焦循和章太炎的性情詩史觀〉，《浙江學刊》6（2006.12），頁 88-92。參考陳學然：〈章太炎研究現況及書目文獻索引（一）～（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3：1-4（2013），頁 195-231；233-261；227-258；251-281。就筆者所見，尚可增補三篇論文：(1) 陳方：〈中國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派在詩學上的抗爭意識——簡記章炳麟、柳亞子詩論〉，《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3（1990.5、8），頁 28-33；(2) 藺文龍：〈論章太炎的詩學觀及創作實踐〉，《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6（2016.11），頁 11-15；(3) 車孟傑：〈論章太炎詩學思想的「情性」範疇〉，《荊楚學術》12（2017.7），頁 101-104。其中，後兩篇是最新的研究，表明太炎詩學似漸有被關注的跡象。

¹⁰ 祝寬：《五四新詩史》，頁 71-80。

〈璞廬詩序〉	《太炎文錄續編》	1921
〈文學之派別〉	《國學概論》	1922
〈答曹聚仁論白話詩〉	《章太炎年譜長編》	1923
〈治平吟草序〉	《太炎文錄續編》	1928
〈游廬山詩序〉	《太炎文錄續編》	1928

在「文學革命」之前，章太炎先後發表《國故論衡·辨詩》、《檢論·六詩說》，這是太炎早期詩論的代表。其中，《檢論》出版於 1914 年，出版年份雖稍後於《國故論衡》，但《煇書》初刻本出版於 1900 年，重訂本出版於 1904 年，卻早於《國故論衡》。¹¹《檢論》為《煇書》的增修重訂本，〈六詩說〉一篇雖不見於《煇書》，而《國故論衡·辨詩》：「賦比興不可歌，因以被簡。」自注「其詳在〈六詩說〉。」¹²可見《國故論衡·辨詩》一篇實撰寫於《檢論·六詩說》之後。

作為晚清考證學的代表人物，太炎詩學有明顯的樸學色彩。¹³在《檢論·六詩說》中，章太炎根據他對《詩經》「六詩」字義的考證，提出兩個重要觀點：第一，詩的本質是性情。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只刪取風、雅、頌三種，是因為九歌、賦、比、興、世等古詩「不道性情怨思之事，學者疲於諷誦，不嫻其藝。」¹⁴這就是說，詩歌作為一門藝術，要讓人諷誦不疲，關鍵在於「道性情怨思之事」；第二，詩具有音樂性。「比、賦、興雖依情志，而復廣博多華，不宜聲樂。」¹⁵章太炎認為，即使是抒寫性情而且富於才藻，要是「不宜聲樂」，也還不能算作詩。章氏此文用考證學

¹¹ 劉淩、孔繁榮編校：《章太炎學術論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頁 1。

¹² 章太炎著，陳平原導讀：《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86。

¹³ 錢仲聯很早就提出類似看法。他指出「章氏站在樸學家的立場來看文學，並以樸學家的治學方法來論文學的義界」。不過，他的側重點是章氏文論，沒有論及章氏的詩學。見錢仲聯：〈清人詩文論十評〉，《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83），頁 42。

¹⁴ 章太炎：《檢論·六詩說》，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第 3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 393。章太炎認為古詩有三千餘篇，孔子刪九歌、賦、比、興，僅存風、雅、頌三百五篇。三千篇外，還有世、奠、繫等，則古詩尚不止三千餘篇。按：關於賦、比、興詩的性質與存亡，歷來頗有爭議。一派認為賦、比、興與風、雅、頌一樣，也是指詩類名。另一派認為風、雅、頌是詩類名，賦、比、興則是從屬於風、雅、頌的寫法名。前一派關於賦、比、興三類詩的存亡又分兩派意見。一派認為孔子刪詩將賦、比、興雜合於風、雅、頌。這一派的代表是鄭玄。另一派認為孔子刪除了賦、比、興。章氏即主后一派說法。參考馮浩菲：《歷代詩經論說述評》（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47-52。

¹⁵ 馮浩菲：《歷代詩經論說述評》，頁 47-52。

的方法對「詩」的本義作了非常精要的提煉，這構成了太炎性情詩學的基本觀念。¹⁶

《國故論衡·辨詩》繼續發展了《檢論·六詩說》的觀點。這體現為以下三點：

第一，提倡性情詩學。¹⁷章氏指出「本情性限辭語，則詩盛；遠情性熹雜書，則詩衰。」¹⁸至於學問、典故，皆非詩之所尚。又說：「蓋箴規誨刺者其義，詩為之名。」¹⁹可見，所謂「情性」並非汎指，而是指兩種內涵：（1）面向社會政治的情感，有箴規誨刺者之義。（2）私人性情，即發抒個人的哀樂喜怒之情。這與我們現代人一般所瞭解的情感或情欲應該予以區別。基於性情詩學的立場，他批評清代後期自曾國藩以來最顯赫的舊詩宗派——宋詩派，呵斥他們「矜其奇詭，天下驚逐，古詩多詰訕不可通，近體乃與杯琖讖辭相等」。²⁰太炎認為，宋詩派由於溺於學問、典故，而且「矜其奇詭」，造成文字多「詰訕不可通」，已經遠離了性情，是不足取的。

第二，提出詩尚意氣說。章氏認為：「韻語代益陵遲，今遂塗地，由其發揚意氣，故感慨之士擅焉，聰明思慧，去之則彌遠。《記》稱『詩之失愚』，以為不愚固不能詩。夫致命遂志，與金鼓之節相依。」²¹此說蓋本於《尚書》「詩言志」而略變其說為「致命遂志」，又《說文》：「志，意也。」²²「言志」本來也可包含發揚意氣之意。章太炎詩尚意氣說的另一個來源蓋本於曹丕「文以氣為主」之說。²³根據郭紹虞的分析，曹丕所說的「氣」兼有才氣、氣勢二義。²⁴章太炎主張詩歌貴有「蹈厲之氣」，

¹⁶ 劉奕稱之為「性情詩史觀」，較本文所用「性情詩學」一詞範圍為窄，但義亦相通。可參看劉奕：〈論焦循和章太炎的性情詩史觀〉，頁 88-92。最新發表的藺文龍〈論章太炎的詩學觀及創作實踐〉，車孟傑〈論章太炎詩學思想的「情性」範疇〉二文，也都注意到這個方，但內容較汎，屬於介紹性質。

¹⁷ 性情詩學的觀念並非章太炎首創，而是淵源甚遠，至少可以追溯到焦循。劉奕便已指出焦、章詩學的這一共識。見劉奕：〈論焦循和章太炎的性情詩史觀〉，頁 88-92。

¹⁸ 章太炎：《國故論衡》，頁 90。

¹⁹ 章太炎：《國故論衡》，頁 87。

²⁰ 章太炎：《國故論衡》，頁 90。

²¹ 章太炎：《國故論衡》，頁 88。

²²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501。

²³ 魏·曹丕：《典論·論文》，收入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58。

²⁴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 91-98。另外，郭紹虞還指出，曹丕的「文氣」說偏重的是作家個人的材性，而不是時代與社會的風氣。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

則主要是指後一含義——氣勢，他認為詩的氣勢與「武節」有關，如果太過文弱，缺乏慷慨蹈厲之節，便喪失了詩人所貴的意氣。在章氏看來，中國社會的「武節」到中唐之後就衰敗了，「故中國廢興之際，樞於中唐，詩賦亦由是不競。」²⁵準此而論，章太炎既對中唐以後的詩均所不取，自然更不會許可晚清樊、易之流的中晚唐詩和晚清以來主盟詩壇的宋詩派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章太炎讚賞中唐以前尚「武節」、有「蹈厲之氣」的詩風，實與他在晚清末造提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²⁶所表露的革命精神一致。

第三，提出詩體代變說。所謂「詩體」，是相對於性情而言，指詩歌的外在形式。從詩歌的音樂性著眼，章太炎指出：「語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此則吟詠性情，古今所同，而聲律調度異焉。魏文侯聽今樂則不知倦，古樂則臥。故知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為美。」²⁷從體裁形制方面著眼，他認為詩從四言變為五言，再變為七言，再變為詞，這是時代變遷的「勢」使然，所以他喜歡用「四言之勢」、「五言之勢」一類的說法。以七言變為詞為例，太炎認為宋代詩勢已盡，抒發性情的載體主要是詞，即「吟詠性情，多在燕樂」。²⁸這意味者，體裁形制是隨著詩歌音樂性的需要而代變。這一點，儘管章氏沒有詳細闡述，但是，如果沿著他的思路，自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新的時代總是有新的「聲律調度」，因而用來表現這些新的「聲律調度」的詩體也應該與時俱進，這個說法實際上為晚清以來的「詩界革命」和後來的「文學革命」提供了一個合理性的論證。明乎此義，就不難理解「文學革命」期間太炎弟子錢玄同何以會熱情襄贊劉半農改革詩韻²⁹，箇中原委並非錢氏背叛師門，攀附胡適、陳獨秀的文學新勢力，而是因為革新詩歌的「聲律調度」以謀求詩

選》第1冊，頁163。而太炎的「文氣」說固然也可指涉作家個人的材性，但毋寧更重視時代與社會的風氣。說詳本段論述。

²⁵ 章太炎：《國故論衡》，頁90。

²⁶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第4冊，頁181。

²⁷ 章太炎：《國故論衡》，頁90。

²⁸ 章太炎：《國故論衡》，頁90。

²⁹ 錢玄同：〈新文學與今韻問題〉，收入趙家璧主編，胡適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頁75。

歌發展正是乃師太炎詩體代變論的題中應有之義。

簡言之，在「文學革命」以前，章太炎已經提出革新詩歌的主張。他提出的詩尚意氣說，具有革命先驅的尚武精神；他提出聲律調度、詩體等詩歌形式層面的革新，也成為「文學革命」期間胡適、劉半農等人提出對詩歌的語言、詩韻、體裁等形式層面進行革命的先聲。不過，章太炎提倡詩歌革新，是以他的詩體代變論為基礎，而詩體代變論的提出又是根據他對中國詩歌本質的認識。他認為中國詩歌具有雙重本質，就音樂性的層面說，詩歌應該隨時代而革新；就性情的層面說，吟詠性情作為中國詩歌的根本精神不應隨時代而變質。二者共同決定中國詩歌的「常」與「變」。

三、「文學革命」之後的太炎詩學

「文學革命」爆發之後不久，章太炎在詩學方面陸續提出了新的看法，這些觀點見於〈與吳承仕書〉、《國學概論》、〈答曹聚仁論白話詩〉、〈治平詩草序〉等文獻中。

1918年，也就是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的次年，章太炎致函吳承仕：

頗聞宛平大學又有新文學、舊文學之爭，往者季剛輩與桐城諸子爭辯駢散，僕甚謂不宜。老成攘臂未終，而浮薄子又從旁出，無異元祐黨人之召章蔡也。³⁰

所謂「老成攘臂」，是指劉師培、黃侃為代表的文選派與林紓、嚴復等代表的桐城派之間的論爭，關於這一論爭，本文不擬討論。³¹所謂「浮薄子又從旁出」，自是指涉胡、陳等「新文學」一派。從這封信可以看出，太炎起初並不願參與新舊文學的論戰。不過，他將胡、陳等人比為依附王安石「新黨」的奸佞小人章惇、蔡京，則見

³⁰ 章炳麟：《章炳麟論學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頁381。

³¹ 關於這場論爭的始末，可參考汪春泓：〈論劉師培、黃侃與姚永朴之《文選》派與桐城派的紛爭〉，《文學遺產》4（2002.8），頁14-28。

其不屑之意。

1922年4月至6月，章太炎應江蘇省教育會邀請，在上海主講國學。事後的講學記錄至少有以下四種版本：(1)《申報》於每次講學次日所發之報導及記錄；(2)《新聞報》記錄本。(3)曹聚仁整理的《國學概論》本；(4)張冥飛記錄並與嚴柏梁共同批註的《章太炎先生國學講演集》。其中，曹聚仁整理的《國學概論》號為善本，最為通行。³²該書記5月27日章氏第九講「續講文學之派別」云：

詩至清末，窮極矣。窮則變，變則通；我們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墮落。所謂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漢、晉，所謂向下墮落就是近代的白話詩，諸君將何取何從？提倡白話詩人自以為從西洋傳來，我以為中國古代也曾有過，他們如要訪祖，我可請出來。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兒子史朝義，稱懷王，有一天他高興起來，也詠一首櫻桃的詩：「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那時有人勸他，把末兩句上下對掉，作為「一半與周贄，一半與懷王」，便與「一半青，一半黃」押韻。他怫然道：「周贄是我的臣，怎能在懷王之上呢？」如在今日，照白話詩的主張，他也何妨說：「何必用韻呢？」這也可算白話詩的始祖罷。一笑！³³

時隔四年，章太炎在演講中針對白話詩提出了公開批評，並以胡人史朝義的打油詩作為白話詩的始祖，顯有揶揄之意。所謂「詩至清末，窮極矣」，表明他對於晚清的宋詩派、中晚唐詩兩個主要流派均所不取，這種見解依舊與《國故論衡·辨詩》一致。此前一年，他為弟子汪東亡故的侄女汪重英作〈璞廬詩序〉，強調「學古而見情性」³⁴，也與《國故論衡·辨詩》的性情詩學同一鼻孔出氣。其不同之處在於：

第一，首次明確提出「白話詩」是中國詩歌的「向下墮落」。這在當時自以為「白話詩」已經取得成功的胡適等人而言，實為當頭一棒。究其原因，章氏認為文學必

³² 王銳對張冥飛本和曹聚仁本進行了對比，指出「雖然張氏同情章太炎關於詩必有韻的主張，但是更多的時候，還是借評語來抒發自己對於社會的激憤之情，以至於和章氏本意相符甚少，並且評論之語字數遠遠超過對章氏言論的記錄，所以這個版本並不能作為初學者瞭解章太炎思想的理想入門書。」見王銳：《章太炎晚年學術思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49-59。

³³ 章太炎講演、曹聚仁記錄：《國學概論》，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國學講義》（北京：海潮出版社，2007），頁57。

³⁴ 章太炎：〈璞廬詩序〉，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第5冊，頁155。

須先辨雅俗，再辨工拙。「雅」與「俗」的判準有二³⁵：一是體裁的雅俗，即所謂「體裁」或「軌則」。他說：「先辨體裁，引切繩墨，然後敢放言也。」³⁶作詩而不能辨體，不得謂之「雅」。（太炎提倡漢晉詩，這是他辨別詩體的結論，辨析詳下文。）太炎又說：「工拙者，系乎才調；雅俗者，系乎軌則。軌則之不知，雖有才調，而無足貴。」³⁷作詩而不講聲律調度，盡廢古法繩墨，亦不得謂之「雅」。二是語言文字的雅俗，「先求訓詁，句分字析，然後敢造詞也。」³⁸遣字造詞皆學有根柢，合乎法度，然後謂之「雅」。可知太炎所謂「俗」，絕非庸俗，而是指通俗，即所謂「便俗致用」。³⁹「便俗致用」也並非易易，因此他說「並世所見，王闈運為能盡雅，其次吳汝綸以下，有桐城馬其昶為能盡俗。」⁴⁰蓋章氏論詩，認為中唐以下不足取，王闈運提倡漢魏六朝詩，不取唐、宋體格，與章氏論詩頗多契合，可謂能辨體，所以「為能盡雅」；吳汝綸以下，雖然不能像王闈運那樣能辨別詩體雅俗，取法中唐以上，卻也能夠講求訓詁，遣字造詞，便俗致用，所以「為能盡俗」。明乎此義，則上述史思明的白話詩只是庸俗，既不符合「雅」的兩個標準，而且夠不上章太炎所說的「便俗致用」的「俗」。

第二，提倡漢晉詩。章太炎聲言「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漢、晉」。⁴¹章氏主張漢晉詩的理由何在呢？早在 1910 年所撰的《國故論衡·辨詩》中，章氏就提出「在漢則主情性」，又主張「物極則變。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古詩斷自簡文以上，唐有陳、張、李、杜之徒，稍稍刪取其要，足以繼風雅盡正變。」⁴²根據章氏對詩體代變的

³⁵ 任訪秋對此有專門分析，認為太炎分辨「雅」「俗」的判準一是「軌則」，二是「便俗致用」。第一個判準與本文大體一致，第二個則不同。本文認為太炎實際上區分了「雅」、「便俗致用」與通常所謂的「俗」（即庸俗），「便俗致用」並非最高標準。詳見任訪秋：〈章太炎文學簡論〉，《開封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1979.2），頁 42-54。

³⁶ 章太炎：〈文學論略〉，收入章太炎著，陳平原編：《章太炎的白話文》（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1），頁 150。

³⁷ 章太炎：《章太炎的白話文》，頁 150。

³⁸ 章太炎：《章太炎的白話文》，頁 150。

³⁹ 章太炎：《章太炎的白話文》，頁 150。

⁴⁰ 章太炎：〈與人論文書〉，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第 4 冊，頁 168。

⁴¹ 章太炎：《章太炎國學講義》，頁 57。

⁴² 章太炎：《國故論衡》，頁 89-90。

分析，唐以後的近體詩已經與「聲律調度」脫節，而漢晉古體詩因為主張情性，不尚學問、典故，乃是中國詩學之正軌。如果仔細檢討，就會發現這中間其實存在著一個矛盾：一方面，因為漢晉詩崇尚性情，章氏認為這是中國詩歌的正軌，所以提倡漢晉詩；另一方面，章氏認為唐以後的近體詩已與「聲律調度」脫節。那麼，更早的漢晉古體詩豈不更與後世的「聲律調度」脫節了嗎？循著前一個主張，中國詩歌在精神上需要復古；循著後一個主張，中國詩歌在形式上需要革新。難怪胡適要指責章氏此說是「極端的復古論，和他的文學史觀，實在是互相矛盾的」。⁴³就上述矛盾的揭發而言，胡適對太炎詩學的批評可謂切中肯綮。

不過，胡適只說對一半：他指出章氏此說的內在矛盾，這是對的；他認為章氏是極端復古，並將章氏的詩體代變說等同於進化論，這是不對的。事實上，章太炎的詩體代變論並不是說詩歌是逐代進化的，而只是說詩體隨著時代的「聲律調度」而轉變，進化論的解釋只是胡適自己比附上去的。太炎的復古論也應該一分为二地看：第一個方面，太炎在民國而提倡漢晉詩，固然可以說是復古的論調，但他提倡漢晉詩的宗旨在於重申中國詩歌重視性情的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講，毋寧說太炎的性情詩學並非復古，也非革命，而是旨在闡發中國詩歌的本質及其亙古不變的傳統，這是無分於復古與革新的；第二個方面，太炎提倡漢晉古體是鑒於唐以後詩歌與「聲律調度」逐漸脫節，他表面上雖是復古，其實質乃是試圖通過提倡古體來解放近體格律的束縛。清末黃遵憲提倡「詩界革命」，其用意在於「古體詩原本不大講究對偶，不限長短，不拘平仄，因此變化的空間廣闊，詩人可馳騁其中，盡情發揮。」⁴⁴這與章太炎從「聲律調度」角度出發要求革新近體詩的意圖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就此而言，無論是黃遵憲的宣導「詩界革命」，還是章太炎的提倡漢晉詩，其內在精神都是對唐宋以來近體詩的革命；其後，胡適等提倡新詩，要求改革詩韻並對舊詩的形式進行革命。⁴⁵其注重「聲律調度」，以及求形式上的解放的旨趣，實際上可視為對黃遵憲、章太炎的繼承與發展。

⁴³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收入姜義華主編，沈寂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28。

⁴⁴ 張堂錡：《黃遵憲及其詩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170。

⁴⁵ 胡適：〈談新詩〉，收入姜義華主編，沈寂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頁384-400。

1923年，曹聚仁來信問白話詩，章太炎有專函回覆：

詩之有韻，古無所變，惟「周頌」有數首似無韻者，則以古詩用韻錯綜無定，其排列不盡同今人。以孔氏聲類法求之，仍非無韻也。本書疑僕所論，只問形式，不論精神。夫文辭之理甚多，而形式各異，非求之形式，則彼此無以為辨；形式已定，乃問其精神耳，非能超然於形式外也。僕所謂形式者，亦只以有韻無韻為界。若夫屬句長短不齊，則樂府已然，所不論已。來書言：女子不著裙，不失為女子；詩無韻，亦不失為詩。所引非其類。女子自然之物，不以著裙得名，詩乃人造之物，正以有韻得名，不可相喻。來書又疑《百家姓》等雖有韻，不得為詩。不知以狹義言，詩之名，則限於古今體詩，旁及賦詞曲而止耳。以廣義言，凡有韻者皆詩之流。箴、誄、哀詞，悉入詩類。《百家姓》者昉於宋人《姓氏急就篇》，其源則史游《急就篇》開之。臚列事物，比而成句；編排各句，合而成韻。《百家姓》然，《醫方歌訣》亦然。以工拙論，詩人或不為；以體裁論，亦不得謂非詩之流也。若夫無韻之作，僕非故欲摧折之，只以詩本舊名，當用舊式。若改作新式，自可別造新名，如日本有和歌、俳句二體。和歌者，彼土之詩也；俳句者，彼土之燕語也。緣情體物，亦自不殊，而有韻無韻則異，其稱名亦別矣。中國古無無韻之詩，有之自胡人史思明始。思明得櫻桃，未知詩而欲作詩，乃曰：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思明之子），一半與周贄（思明用事之臣）。人曰：「何不使懷王、周贄上下易之，則成韻矣？思明大怒曰：『豈可使周贄居我兒上耶！』」此事相傳，以為笑柄。今若以無韻詩家之說評之，則思明乃不誤，而笑之者真誤也。然乎？否乎？必謂依韻成章，束縛情性，不得自如，故厭而去之。則不知樵歌、小曲，亦無不有韻者，此正觸口而出，何嘗自尋束縛邪？絕句不過二三韻，近體不過四五韻，古體語雖繁複，用韻轉換，亦得自由。惟詞之用韻稍多，而小令亦只數語，絕無束縛情性之事；若並此厭之，無妨如日本人之稱俳句。若不欲用日本名詞，無妨稱為燕語。不當以新式強合舊名，如史思明之所為也。苟取歐美偶有之事為例，此亦歐美人之紕漏耳，何足法哉！⁴⁶

這封信詳細表述了太炎晚年詩學的主張，具有重要意義，但在過去的論述中罕有注

⁴⁶ 章太炎：〈答曹聚仁論白話詩〉，轉引自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731-732。

意，故本文詳引於此。⁴⁷該信專論白話詩，極有針對性，提出詩必須同時具備「形式」與「精神」。所謂「形式」，最基本的底線便是韻的有無。此外，上文業已指出，章氏用「雅」、「俗」之辨來斥責白話詩是中國詩歌的「向下墮落」，而「雅」的標準是由語言文字和體裁兩個方面構成。如果將詩韻單獨從語言文字的要求之外提出，則體裁、語言文字、詩韻三者正是章太炎與新詩學的主要分歧所在，也正是胡適主張詩歌形式革命的三個方面。胡適的新詩學主要提出三項主張：第一，在詩體方面，主張自由體、不拘格律；第二，在語言方面，主張用白話作詩；第三，在詩韻方面，主張韻腳、平仄都不重要。⁴⁸前文已經指出，太炎主張詩體代變，原則上並不反對在體裁、語言文字、詩韻方面隨著時代而進行革新，但他堅持詩必有韻的底線。如果硬要創作無韻的白話詩，就應該另立名目，而不應稱為白話「詩」，以免混淆中國詩的名實。章太炎在這一點上態度頗為堅決。

至於中國詩的本質或精神，章氏在《國故論衡·辨詩》、《檢論·六詩說》中已釐定其內涵。1918年，「文學革命」爆發後，太炎在〈璞廬詩序〉中表達的也依然是《國故論衡》中提出的性情詩學觀點。1928年，章太炎為黃侃撰寫〈游廬山詩序〉，稱道黃侃「篇什多五言，猶近古」、「獨其所為四言，上不逮仲宣，而下幾與叔夜、元亮侷矣」⁴⁹，可見漢晉詩仍是章氏心目中的理想詩體，只是他此時已經不再特別標榜漢晉詩的名目罷了。同年，章太炎為李學詩的《治平詩草》撰序：

詩以道性情。六義衰，性情之間始有偽飾者，然唐以上猶少是，隱遁則有長往之辭，軍旅則有不可犯之色，榮辱得失，亦各如其所遇。以形於言，雖乾沒如宋之問輩，亦舉念不忘富貴而已。自宋以後，詩與性情離，怙權而稱恬退，馮生而言任達，得意恣欲而為牢愁之聲，雖有名章曼辭，為世所稱道者，欲依以觀其志，則不能已。……晚世誇誣之子，好為異言，以街談巷語為詩，

⁴⁷ 就筆者檢閱所及，引述該信的研究僅有兩篇論文：(1) 董國炎、辛為稼：〈章太炎的文學語言觀芻議〉，《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983.5），頁60-63；(2) 潘建偉：〈章太炎眼中的白話文運動〉，《魯迅研究月刊》10（2011.11），頁50-55。兩文並未詳引此信，而且側重點都不在論述章太炎的詩學。此外，時世平：〈章太炎的漢語言文學觀〉，《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3：2（2014.3），頁68-77。此文註中也提及該信。

⁴⁸ 胡適：〈談新詩〉，收入姜義華主編，沈寂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頁384-400。

⁴⁹ 章太炎：〈游廬山詩序〉，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第5冊，頁155。

謂之清真，然觀其人，則汲汲為貨利者，而詩中隱晦，如故匿其性情，則言已飾偽矣。焉論其辭之文質也？⁵⁰

在這篇序裡，章太炎明確強調「詩以道性情」的說法，再次重申了他的性情詩學的主張。他認為性情有真偽之分，宋以後「詩與性情離」，偽飾的成分很多，大抵不是真實的性情，唐以上則較少這種情形。可見，章氏晚年依然矚意漢晉詩，只是他不是從強調形式雅俗的角度立論，而是從性情真偽的角度來說。章氏批評「晚世誇誣之子，好為異言，以街談巷語為詩」，這也與他 1918 年以來批評白話詩的立場一致，只是，章氏此前對於白話詩的批評主要是從詩的形式包括體裁、語言文字和詩韻三方面提出的，而在這裡，他更從詩的精神即性情的角度對白話詩提出批評。在他看來，白話詩不只是形式上「好為異言，以街談巷語為詩」，而且在精神上多是「誇誣之子」、「觀其人，則汲汲為貨利者」、「詩中隱晦，如故匿其性情，則言已飾偽矣」。如果說這也是有性情的話，那只是情欲熾盛而已，已經偏離儒家詩學所謂文質彬彬、形神並重的舊傳統。⁵¹這可說是太炎晚年針對白話詩提出嚴厲的誅心之論。其捍衛的並不只是詩必有韻而已，更進而捍衛「詩」必須有真性情的根本精神。

四、結論

毋庸置疑，近百餘年來中國詩歌與詩學經歷了劇烈的革命，也進行了多方面的嘗試，「文學革命」在理論與實踐上的確開闢了中國詩歌的新方向。然而，正如富蘭克斯（Wolfgang Franks）指出的那樣，中國的「革命」觀念並非完全是西方的舶來品，而是兼有其內源。而且，對「革命」觀念的反省與批判同樣也相伴而生。本文

⁵⁰ 章太炎：〈治平詩草序〉，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第 5 冊，頁 153-154。

⁵¹ 關於性情的界說，已見上文。儒家詩學主張性情與詩歌形式是統一的關係，即孔子提倡的「文質彬彬」（《論語·雍也》）。太炎的雅俗之辨雖然側重在詩歌形式的角度立言，強調詩歌要遵守體裁、語言文字、詩韻方面的法度，其實也是對性情的整飭和約束。白話詩要求詩歌形式的解放，也勢必突破性情的整飭和約束。因此太炎晚年專從性情批評白話詩，實為誅心之論。關於儒家詩學形式與精神的統一，可參看劉石：〈論古代文藝學的主神重形傳統〉，《中華文史論叢》104（2011.12），頁 81-100。

的研究表明，晚清民國之際的舊詩作家與舊詩學者在文學史上的定位應該予以重估，不能總被邊緣化或定調為「文學革命」的批判者、落伍者。可能與某些文學史的敘述恰恰相反，這些人其實恰恰原本是被忽略的「文學革命」的先驅。事實上，他們的許多觀念後來成為「文學革命」的先聲，只不過在後期的發展中，由於他們對「文學革命」有所反省和批判，於是發生身份逆轉，原本的「先驅」被定調為後來的「批判者」。職是之故，這些晚清民國之際大轉型時代的舊學大師往往同時兼具「先驅」與「批判者」的雙重身份，本文對章太炎詩學的考察便提供了這樣一個典型的個案。

以「文學革命」為界，太炎詩學可分為前後兩期。太炎前期詩學的代表著作是《國故論衡·辨詩》、《檢論·六詩說》，在這時期，章氏嘗試用考證學的方法界定中國詩歌的本質，並對晚清的宋詩派、中晚唐詩派都提出批判。在此意義上，章太炎的詩學主張是在對晚清以來居於主流的宋詩派以及中晚唐詩派批判的基礎上提出的。在《國故論衡·辨詩》中，章太炎提出詩的音樂聲調隨時代而轉變，由此，太炎發展了他的性情詩學，並提出詩體代變說，主張在聲律調度、詩體等詩歌形式層面進行革新，這成為「文學革命」期間胡適、劉半農等人提出對詩歌的詩體、語言文字、詩韻等形式層面進行革命的先驅。同時，太炎還提出詩尚意氣說，也彰顯出革命的精神。

在「文學革命」以後，章太炎後期詩學明顯受到文學革命運動的衝擊並對胡適等人提倡的白話詩提出批判。在〈答曹聚仁論白話詩〉中，章太炎提出詩必須具備「形式」與「精神」，在精神方面，太炎一再重申他的性情詩學，強調中國詩歌崇尚性情的傳統；在形式方面，太炎提出雅俗之辨、詩必有韻說。隨著「文學革命」日趨激進，相形之下，章太炎反而顯得保守，於是由「文學革命」的「先驅」一轉身而變為「批判者」。太炎晚年與「文學革命」導師如胡適等人的分歧在於：第一，太炎一再強調，詩的本質是性情，這是不容許革命的。他特別提出性情的真偽之辨，並認為「文學革命」時期的白話詩偏離了中國詩歌崇尚真性情的傳統。第二，在詩體、詩韻、語言等形式層面，太炎早年即提出革命的主張，但在「文學革命」爆發後，他著重強調革命不能無限度地突破底線，他堅持詩必有韻，認為這是中國詩歌的底線；其次，雅俗之辨也應該謹守，否則，如果不辨詩體，不講訓詁詞章，詩歌

的精神則將淪為庸俗，並非通俗，從而導致詩歌的精神伴隨其形式一起「向下墮落」。

對於章太炎而言，在「文學革命」的「先驅」與「批判者」的雙重身份之間，並不必然存在邏輯的矛盾。木山英雄便指出，新文化運動的「文學革命」與章太炎的「文學復古」具有繼承關係。以詩歌為例，章氏提倡漢晉古體，即有打破純文學與俗文學壁壘的意義，實已接近白話詩的革命旨趣；不但如此，章氏還曾對最早介紹拜倫的蘇曼殊的譯詩加以修改，自己也試著翻譯了一首。⁵²章念馳認為章太炎的「文學復古」類似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即以復古為革新。又說章氏的文學主張深深影響了陳獨秀和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但未能提出論證。⁵³本文的研究通過對章氏詩論的爬梳和分析具體解釋了此矛盾的形成：章太炎認為中國詩歌在精神上具有不變的本質，同時，詩歌形式則應該因應時代而進行「革命」，但如前所述，革命畢竟應該有其底線。從主張詩歌形式需要革新的一面來看，章太炎是「文學革命」的先驅者；從反對無底線的文學革命來看，他又是「文學革命」的批判者。儘管如此，正如胡適指出的，太炎詩學的內在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太炎提倡漢晉詩；另一方面，太炎又認為詩歌的形式應該根據時代而變革，那麼，民國以後的詩歌自當因應民國的「聲律調度」。這恰恰說明，白話詩的出現實有合符詩歌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為什麼一定要提倡漢晉詩呢？由此可見，太炎儘管在理論上認識到詩歌形式應該根據時代而變革，但一旦落到實踐層面，他卻只能從舊詩中尋找資源，而無法切實地針對民國的「聲律調度」進行與時俱進的探討，從而也就無法為民國以來中國詩歌在形式方面的革新指示一條可被新舊雙方都接受的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而他對魏晉詩的提倡也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論說明與實踐示範。而這一工作，正是「文學革命」期間胡適、劉半農等人新詩理論與實踐的努力方向。至於胡、劉等人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獲得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如太炎所批評的，已經背離中國詩歌的本質，這就是另一問題了。

⁵²〔日〕木山英雄著，趙京華編譯：《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226-229。林少陽也提出類似看法，認為從章太炎到魯迅只是從晚清復古的新文化運動到反復古的新文化運動的繼承與發展。可參看林少陽：《鼎革以文——清季革命與章太炎「復古」的新文化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⁵³章念馳：《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57。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984。

章太炎：《章太炎國學講義》，北京：海潮出版社，2007。

章太炎著，陳平原導讀：《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章太炎著，陳平原編：《章太炎的白話文》，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1。

二、近人論著

王銳：《章太炎晚年學術思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 任訪秋：〈章太炎文學簡論〉，《開封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1979.2)，頁 42-54。

李笠：〈書章炳麟六詩說後〉，《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6：61 (1928.12)，頁 29。

* 李躍力：《革命與文學的深層互動：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革命話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汪春泓：〈論劉師培、黃侃與姚永朴之《文選》派與桐城派的紛爭〉，《文學遺產》4 (2002.8)，頁 14-28。

車孟傑：〈論章太炎詩學思想的「情性」範疇〉，《荊楚學術》12(2017.7)，頁 101-104。

* 林少陽：《鼎革以文——清季革命與章太炎「復古」的新文化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金束雷：〈章太炎先生詩辨論旨〉，《中央時事週報》4：22 (1935.6)，頁 66。

姜義華主編，沈寂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北京：中華書局，1993。

時世平：〈章太炎的漢語言文學觀〉，《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3：2 (2014.3)，頁 68-77。

- * 祝寬：《五四新詩史》，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 張堂錡：《黃遵憲及其詩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 * 章念馳：《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
- 章炳麟：《章炳麟論學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
- 郭延禮：《20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 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 陳方：〈中國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派在詩學上的抗爭意識——簡記章炳麟、柳亞子詩論〉，《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3（1990.5、8），頁28-33。
- * 陳建華：〈現代中國革命話語之源〉，《二十一世紀》41（1997.6），頁83-96。
-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陳學然：〈章太炎研究現況及書目文獻索引（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3：1（2013.3），頁195-231。
- 陳學然：〈章太炎研究現況及書目文獻索引（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3：2（2013.6），頁233-261。
- 陳學然：〈章太炎研究現況及書目文獻索引（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3：3（2013.9），頁227-258。
- 陳學然：〈章太炎研究現況及書目文獻索引（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3：4（2013.12），頁251-281。
-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 馮浩菲：《歷代詩經論說述評》，北京：中華書局，2003。
- 董國炎、辛為稼：〈章太炎的文學語言觀芻議〉，《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983.5），頁60-63。
- 趙家璧主編，胡適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
- 劉石：〈論古代文藝學的主神重形傳統〉，《中華文史論叢》104（2011.12），頁81-100。

- * 劉奕：〈論焦循和章太炎的性情詩史觀〉，《浙江學刊》6（2006.12），頁 88-92。
劉凌、孔繁榮編校：《章太炎學術論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潘建偉：〈章太炎眼中的白話文運動〉，《魯迅研究月刊》10（2011.11），頁 50-55。
- * 錢仲聯：《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83。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 藺文龍：〈論章太炎的詩學觀及創作實踐〉，《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39：6（2016.11），頁 11-15。
- *〔日〕木山英雄著，趙京華編譯：《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Apter, David E. & Saich, Tony,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Franks, Wolfgang, *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1851-1949*,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0.
- Larson, Wendy, *From Ah Q to Lei Feng: Freud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20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Schwartz, Benjamin I.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Jian Hua, “Xian Dai Zhong Guo Ge Ming Hua Yu Zhi Yuan” [The Origin of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in *Er Shi Yi Shi Ji* [Twenty-First Century Bimonthly] No. 41 (Jun. 1997), pp. 83-96.
- Kiyama Hideo, *Wen Xue Fu Gu Yu Wen Xue Ge Ming: Mu Shan Ying Xiong Zhong Guo Wen Xue Si Xiang Lun Ji* [Literature Renaissance and Literature Revolution: Kiyama Hideo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Li Yue Li, *Ge Ming Yu Wen Xue De Shen Ceng Hu Dong: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Zhong De “Ge Ming Hua Yu” Yan Jiu* [The Deep Interaction between Revolution and Literature: Study on the “Revolution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3).
- Lin Shao Yang, *Ding Ge Yi Wen: Qing Ji Ge Ming Yu Zhang Tai Yan Fu Gu De Xin Wen Hua Yun Dong* [Revolution by Literature: The Late Qing Revolution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Zhang Tai Yan by Restoring the Ancient Cultur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 Lin Wen Long, “Lun Zhang Tai Yan De Shi Xue Guan Ji Chuang Zuo Shi Jian” [On Zhang Tai Yan’s Poetics and Creation Practice], in *Shan Xi Da Xue Xue Bao (Zhe Xue She Hui Ke Xue Ban)*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39(6) (Nov. 2016), pp. 11-15.
- Liu Yi, “Lun Jiao Xun he Zhang Taiyan de Xingqing Shishi Guan” [On the View of Poetic History of Jiao Xun and Zhang Tai Yan] in *Zhe Jiang Xue Kan*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No. 6 (Dec. 2006), pp. 88-92.
- Qian Zhong Lian, *Meng Tiao An Qing Dai Wen Xue Lun Ji* [Collected Papers of Meng Tiao An on Literature in Qing Dynasty] (Jinan: Qilu Press, 1983).
- Ren Fang Qiu, “Zhang Tai Yan Wen Xue Jian Lun” [A Brief Discussion on Zhang Tai Yan’s Literary Views] in *Kai Feng Shi Yuan Xue Bao (She Hui Ke Xue Ban)* [Journal of Kaifeng Normal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No. 1 (Feb. 1979), pp. 42-54.

Zhang Nian Chi, *Wo Suo Zhi Dao De Zu Fu Zhang Tai Yan* [My Grandfather Zhang Tai Yan as far as I knew]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2016).

Zhu Kuan, *Wu Si Xin Shi Shi* [History of May Forth New Poems] (Xi'a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7).